



式。另外一种更加注重内在的精神修炼和玄思冥想,强调苏非信仰中神秘主义的因素,更多地与哲学思辨联系在一起。虽然两种潮流共存,并在一些苏非修炼者身上合而为一,但是一般来看,尊奉前者的多为普通信众,而注重后者的则带有精英化特色。这一时期对苏非主义的打击,主要是针对第一种力量。而第二种力量由于疏远政治,神秘主义色彩浓厚,不对王朝统治构成直接威胁,因此更易受到比较宽容的对待。

在萨法维王朝前期,什叶派乌勒玛虽然受到优待,但是他们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集团。在打击正统什叶派信仰之外其他派别的工作中,王权显然比什叶派乌勒玛更加急于行动。王权对非主流宗教势力的整肃,恰恰为什叶派乌勒玛力量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正如韦伯所说,政治权力的“世俗之腕”可为教教的发展提供极有价值的支援。^①

第四节 萨法维王朝的宗教政治体制

一、宗教体制

萨法维王朝沿袭了自贴木儿和白羊王朝以来的宗教制度,包括清真寺、宗教学校,宗教赠予、卡迪制度等,并通过贴木儿时期设立的萨德尔一职对这些机构进行控制。贴木儿时期,萨德尔的地位相当重要,其职责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监督管理宗教赠予,负责将其收益分配给宗教院校的学生、学者以及相关慈善机构;二是监管神圣律法的实施。萨法维王朝初期频频展开军事行动,萨德尔同时还兼有埃米尔(*amir*,将军)的职能。1514年,伊斯马仪国王被奥斯曼帝国击败,对外征服就此停止,萨德尔才逐渐脱离军事活动,

^①[德]马克思·韦伯,康乐,简美惠译:《支配社会学》II,第385页,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

而专司宗教和法律方面的事务。

在萨法维王朝时期,宗教赠予由国家集中管理,委派一个或两个萨德尔监管,萨德尔再指定各地的代理人具体管理。不过,个别特别重要、宗教赠予丰富的圣地,比如马什哈德、阿达比尔的监管人不由萨德尔指派,而是国王亲自指派,这些职位一般被波斯贵族所把持,别人很难染指。每个城市中的伊斯兰长老(*Shaikh Islam*)和卡迪(*qadi*,即教法执行官)虽然也由萨德尔指定,但是他们一般都是宗教学者出身,在任职的同时往往还会在自己的住所或其他地方开班授课。另外城市中还有一定数量的宗教学校,一些宗教学校配备有宿舍,学生的食宿都可以从宗教赠予的收入中获取补贴。通过萨德尔、伊斯兰长老、卡迪这些职位,萨法维王朝把经济、法律、教育和宗教体制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萨法维王朝初期的什叶派宗教学者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前面提及的官方宗教学者,即由国家供养的宗教学者。国王从宗教学者中挑选出一些人,委任以与萨法维王朝的行政机构等级相符的职位。其中职位最高的是王朝后期设立的“毛拉·巴施”(*mull ā b ā sh ī*),即众毛拉的首领,大毛拉。能够担任这一职务的宗教学者应该具有很高的宗教和道德声望,他的职责是负责为国王提供宗教事务方面的咨询,以及在不同场合为国王祈祷。之下应该是萨德尔,他们同时兼有宗教和行政两种职权,由国王亲自挑选,其地位与奥斯曼帝国的大穆夫提基本相同。萨德尔负责一切官方宗教事务,包括在一些下级职位的乌勒玛协助下监管瓦克夫,还负责在国王的授权下,指派各个城市的卡迪和伊斯兰长老。萨德尔分为两类,一类在王室领地上行使职权,另一类在各省发挥作用。萨德尔一职常常是一些地位显赫的波斯贵族家族所把持,其任期很长,到王朝晚期甚至是终身任职。

第二类宗教学者就是那些不依附于中央政府,而凭借自己的声望获取信众支持的乌勒玛。这类乌勒玛中地位最高的是那些穆



智台希德,即有能力进行创制的人。他们能就宗教问题和法律问题给出建议,因其博学和虔诚而备受社会尊重,被认为是隐遁伊玛目的代表。穆智台希德之下就是那些满足信众日常宗教需求的人,比如清真寺里的领拜人。值得注意的是,在什叶派的历史上,各清真寺的领拜人一般是由信众按照自己的意愿推举,而不是由官方权威指定。由于两类宗教学者的互相流动,在一些情况下,官方宗教学者也会成为领拜人。

除了宗教学者之外,作为先知后裔的赛义德家族一直拥有特殊的地位。虽然赛义德们也需要掌握一定的宗教知识,但是他们受到尊崇的原因主要是其源自于先知和伊玛目的高贵血统。在萨法维王朝,赛义德几乎不参与国家的行政管理,但是他们收取札克特和更为可观的胡姆斯,还定期从宗教赠予的收益中获取津贴。

二、波斯贵族与阿拉伯学者的冲突与融合

自蒙古人统治波斯地区以来,一些波斯贵族家族就具有极其显赫的地位,他们是地方管理,特别是行政和司法管理方面的最佳候选人。萨法维王朝建立之后,那些抵制新政权的贵族受到严厉的惩处,一些不愿公开放弃逊尼派信仰又让皈依什叶派的贵族不得不举家迁移。而愿意放弃逊尼派信仰,积极与新政权合作的波斯贵族迅速融入本来以土库曼人为主的领导阶层,在国家管理方面继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萨法维王朝前期波斯贵族与宗教学者阶层的冲突与融合,对宗教学者阶层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谢赫卡拉奇(Muhaqqiq Karak ī)的经历就是这一冲突和融合过程的缩影。

卡拉奇于1466年左右出生于一个阿拉伯宗教学者家庭。1504年,他从叙利亚移居纳杰夫。之后不久,他应伊斯马仪国王的邀请,开始出没于萨法维宫廷。在以什叶派为国教的新国家中,卡拉奇对于如何把国家政治秩序置于宗教规范之下有诸多设想。早在1510

年,在一篇谈论农业税收问题的文章中,他就明确地提出了代替隐遁伊玛目行使某些权力的观点。而此前,对伊玛目隐遁期间什叶派穆斯林是否应该举行周五聚礼这类的问题,什叶派教法学家一直争论不休。卡拉奇提出,在伊玛目隐遁期间举行周五聚礼是合法的,因为乌勒玛可以代替伊玛目来领拜。1510年左右,他与其他什叶派乌勒玛一起前往赫拉特等地,在新近征服的地区宣传什叶派信仰。据记载,伊斯马仪国王每年要拨给他七万第纳尔,用以支持他的教学工作。

在塔赫马斯普国王时期,卡拉奇更受器重。塔赫马斯普曾颁布两份诏书,赠与他土地,豁免税收。在这两份诏书中,卡拉奇被尊为“伊斯兰的证据”,“人民的指引者”。国王要求所有官员和贵族都要以卡拉奇为“他们的指引者和典范”,在一切事务上听从他。文件赋予卡拉奇非常广泛的宗教和政治权威,以及特殊的财产权和豁免权。^①虽然卡拉奇并没有担任任何行政职务,但1532年国王正式认可了他作为“封印穆智台希德”(khātām al-mujtahid ī n)和“伊玛目代理人”(nā'ib al-imam)的地位,并赋予他直接管理国家宗教事务的权威。因此,这些诏书的重要意义在于,正式认可了当时最重要的穆智台希德的至高无上的宗教权威。而这一权威与国家宗教体制内的萨德尔等职位所具有的权威不同,体现了独立于国家体制之外的宗教学者力量的增长。

卡拉奇的所作所为引发了他与当时担任萨德尔的波斯贵族达什塔基(al-Dashtaki)的矛盾。塔赫马斯普支持卡拉奇,1531年他罢免了达什塔基,听从卡拉奇的建议任命波斯贵族出身,又是卡拉奇门徒的穆尔兹丁·伊斯法罕尼(Mu'izz al-Din al-Isfahānī)为萨德尔。在穆尔兹丁·伊斯法罕尼尚未能前来就职期间,卡拉奇代行萨德尔职权,全权负责宗教官员的任免。由于卡拉奇显赫的影响,他

^①两份诏书见 S. A. Arjomand, *Authority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Shi'ism*, pp.250-262, SUNY Press, 1988.



被人们尊称为“时代的穆智台希德”。1534年卡拉奇去世,他的主张对此后什叶派宗教体制在伊朗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536年,穆尔兹丁去职,卡拉奇的另外一个学生米尔·阿萨杜拉·舒什塔里(Mir Asadullāh Shūshtārī)被任命为萨德尔,在任长达二十余年。但是卡拉奇试图以什叶派宗教学者取代波斯贵族,控制萨德尔职位的想法未能坚持下去。舒什塔里去世后,萨德尔重新成为波斯贵族的专属。

卡拉奇试图通过控制萨德尔职位,把宗教、法律、行政的权威集合在宗教学者身上,真正代替隐遁的伊玛目进行统治,但他的努力未能成功。什叶派宗教学者也没有因此而进入国家管理阶层,成为政治体制的核心。但是这对宗教学者的宗教权威却没有产生影响,相反却强化了他们在政治领域之外的权威。从严格的伊斯兰教义来讲,伊玛目从先知那里继承了高贵的血统和隐秘的知识是他具有权威的关键依据。而乌勒玛则是典型的“俗人”,不具有任何神圣的特质,伊玛目隐遁之后什叶派宗教学者中出现的神权贵族完全没有基础。但是,随着宗教学者在伊玛目隐遁之后的作用日渐增加,在普通什叶派信徒看来,乌勒玛受先知和伊玛目所赐,总是带有某种普通信徒没有的特征,特别是在宗教知识方面。随着十二伊玛目派逐渐成为什叶派中的正统派,乌勒玛的地位逐渐增强。在日常生活中,普通信众要征询乌勒玛的意见,由他们从对《古兰经》和圣训的知识出发,来判断哪些行为是可行的,而哪些是被禁止的。乌勒玛作为宗教教师的地位不断加强。而在萨法维王朝最初关于伊玛目隐遁期间举行周五聚礼是否合法的争论平息之后,乌勒玛作为领拜人,其重要性和必然性也日益得到认可。

作为来自阿拉伯世界的什叶派乌勒玛,他们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国家有非常深刻的认同,也缺乏广阔的法律、行政、经济和政治基础。对于在阿拉伯世界长期处于受压制状态的什叶派穆斯林来说,这些宗教学者的主要职责是提供教义、礼仪及其教法学方面

的建议。学者们往往避居一隅,潜心研读经典,其兴趣主要集中在信仰方面。当他们来到伊朗,其合适的位置就是担任各地的伊斯兰长老或是清真寺的领拜人,或是作为宗教教师,就教义、教法问题提供咨询。最初,他们的人数并不是很多,而伊斯兰长老这样的职位也不可能全部由他们来担当。但是随着什叶派信仰的传播和宗教教育的发展,这些职位越来越倾向于由专业的宗教学者来担任,穆智台希德、伊斯兰长老、大清真寺的领拜人逐渐形成了一个受外界影响、但同时又相对独立的宗教学者阶层。

与以上过程相伴随的,是波斯贵族和阿拉伯宗教学者之间由冲突逐渐走向互相融合。随着阿拔斯一世以来中央集权的加强,卡迪制度趋于衰落,无论卡迪的数量还是卡迪的重要性都大不如前。这样一来,本来可以任免卡迪的萨德尔的权限也受到局限。王朝早期的波斯贵族在宗教体制中的优势地位受到挑战,与宗教密切相关的法律和教育的格局随之发生变化。从王朝早期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波斯贵族对备受国王重用的卡拉奇这类阿拉伯宗教学者曾怀有敌意,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个阶层的融合,但是变化还是逐步出现了。那就是宗教学者日益职业化,一些波斯贵族家庭的年轻成员也开始投身宗教学术活动并与著名的乌勒玛家族联姻。比如卡拉奇的学生中担任萨德尔的两人,都出身波斯贵族家庭。而卡拉奇的家族也开始和波斯贵族联姻,他的女儿嫁给了波斯贵族。后来继承“时代的穆智台希德”称号的就是他的外孙。到了17世纪,伊斯法罕成为什叶派的学术中心,大部分著名的什叶派学者已经是伊朗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波斯贵族的后代。在这种融合中,什叶派乌勒玛真正强大起来。